

# 从《红楼梦》书名的英译看文化意象的可译性限度

戚 健

(东莞理工学院 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106)

**摘 要:**《红楼梦》书名英译的难题折射出了文化意象的可译性限度,但可译性限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增强而逐渐降低的。从这个趋势来看,文化意象的翻译应尽量采取异化手段法,尽可能完整地传递原文意象,如果“意”“象”不能两全,则取“象”而舍“意”,即保留源语中的意象符号,期待中西文化的融合使西方读者对中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而逐渐理解其文化内涵。

**关键词:**《红楼梦》;英译;文化意象;可译性限度

《红楼梦》两个全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和霍克斯先生的译本,以下简称为杨译本、霍译本)中书名的翻译是《红楼梦》英译研究的焦点之一,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两种译法到底哪种较好?有没有比这两种译法更好的译名?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单单一个书名为何如此难译?问题的关键在于“红楼”这个意象文化意蕴的多重性与丰厚性及其在英语文化中的缺失。《红楼梦》书名英译的难题实际上折射出了文化意象的可译性限度。文化意象到底可不可译?该如何译?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 一 “红楼”意象探源及“红楼梦”的文化阐释

关于“红楼”意象的文化意蕴,有学者认为,“红楼”即“闺阁”、“闺房”之意。<sup>[1-3]</sup>也有学者认为,“红楼”既指侯门大院,又指旧时富家女子的住处。<sup>[4]</sup>俞晓红<sup>[5]13-18</sup>通过广泛搜检历代诗词中的“红楼”例句对“红楼”这一意象进行了探源,归纳出了“红楼”一词的七种涵义,并进而论定:“红楼”意象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指代是“富贵人家宅院和富家女子楼阁”。据此,俞晓红<sup>[5]17-18</sup>指出:“《红楼梦》既象征朱门红楼的贾府终归散亡败灭、梦幻一场,又喻指书中所有青春女子最终逃脱不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命运。尤其在清朝,门楼漆色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而世代簪缨之族的贾府两座大门都是大红漆色,所以,红楼梦无疑寄寓着贾府这个贵族之家盛极而衰的悲剧必然性。在这个家族历史悲剧的大背景下,演出了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和以钗黛为代表的所有青春女子的命运悲剧。这三重悲剧,是《红楼梦》多义性主题中最重要的三层内涵。正是因为这种极强的涵容性使得《红楼梦》这一书名在多种书名中经过时间的淘洗,最终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sup>[5]13</sup>然而也正是这种极强的涵容性造成了翻译

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 二 《红楼梦》书名英译的争议与“红楼”意象的翻译

《红楼梦》书名有《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情僧录》等多种,《红楼梦》是现今中外通行的书名,杨译本即采用此书名,译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而霍译本却取《石头记》,译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个迥异的译名在《红楼梦》英译研究者中引发了热烈的争议。

先来看看杨译本的译名: A Dream of Red Mansions。这一译名与原名字对应且用词准确,看似无懈可击。冯庆华<sup>[3]3</sup>指出, mansion 在英语中意为“宽敞而庄重的房子”,与《红楼梦》里“楼”字相符,“译者不光用了更确切的单词 mansion,而且用了更为合适的复数形式。《红楼梦》主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宁荣两府里的故事,而在杨宪益夫妇的译文中宁国府与荣国府分别被译成 the Ning Mansion 和 the Rong Mansion,因此把“楼”译成 mansion,而且采用复数形式,完全体现了作者的原意。单看一个 mansions 确实准确地体现了作者的原意,但 red mansions 两个词合在一起就与作者的原意相去甚远了。如前文所述,“红楼”是一个具有深厚蕴意的文化意象,指代“富贵人家宅院和富家女子楼阁”,而不仅仅只是指红颜色的房子和楼阁。而 red mansions 在西方人眼里,不过是红色的房子而已。A Dream of Red Mansions(红色房子中的一场梦)可能传达了一种浪漫的情调,但却大大削减了原书名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传达的魅力。<sup>[4]</sup>因此,从“红楼”作为一个意象的文化考量来看,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不算是一个理想的译名,因为它虽然准确地传递了这个意象的“形”,即字面意思,却未能传达这个意象的“意”,即所负载的文化含义,得“形”而失“意”,造成了原文意象在译语中的

收稿日期: 2009 - 03 - 10

作者简介:戚 健,女,湖南溆浦人,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语篇分析。

缺损,因而绝大多数学者对此译名持否定态度。

再来看霍译书名 *The Story of the Stone*。许多学者认为,这个译名与此书的本名更为相符。<sup>[3,4,6]</sup>然而,根据范圣宇<sup>[7]29</sup>对两个译本的底本研究,霍译本主要依据的是程译本,而程本系统的题名应该是《红楼梦》。这一点译者本人在译本序中说得很清楚:“本书前八十回虽然偶然参照一种或几种八十回抄本的文字,总体上却是遵循高鹗的一百二十回本的。选择《石头记》作为书名,却不是高鹗一百二十回本的题目,而是脂砚斋在八十回手稿上的题名……高鹗为印刷本选择的实际上是第四个书名(即《红楼梦》)。这也是今天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通用的书名。”<sup>[7]314</sup>

有学者认为,霍克斯之所以选择《石头记》这一书名,主要原因是要回避《红楼梦》书名中的“红”字,以避免英语读者对 red 产生误解。“霍克斯不能简单地把‘红’拿掉,译成‘楼中之梦’,更不能‘归化’成《绿楼梦》。译者干脆采用另外一个没有文化歧义的书名《石头记》来进行翻译,解决了这个翻译中的难题。”<sup>[3]13</sup>“红”这个意象在汉语与英语文化中的错位固然是《红楼梦》英译中的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霍克斯采用了归化法,通篇以“绿”代“红”,实在不能以“绿色”代替的地方则以“金色”来代。这一点霍克斯<sup>[7]337</sup>本人在译本序中也曾提到:

不管怎样,红楼梦的爱好者会发现我的翻译中丢失的一种意象是这部小说中充斥着“红”。小说的书名是以“红”字开头的,“红”也是其中不断出现的一个象征——有时指春天,有时指青年,有时是好运或繁荣。遗憾的是,除了年轻人玫瑰花般的面颊和红色的嘴唇,“红”在英语里却没有这种联想,而我发现,中国的“红”与英语里的“金色”或“绿色”倒是相近。我知道这样做失去了某种东西,但却无力改变。

霍克斯以“红”代“绿”的无奈之举招来颇多指责,如冯庆华<sup>[3]459</sup>就说:“红与绿,这是《红楼梦》翻译的一个基本问题,肆意归化不只是多少有点损失,而是无可挽回的大损失。‘红’与《红楼梦》贾宝玉、甚至曹雪芹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任何重大的更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可见文化意象翻译的重要性及两难困境。”

但霍克斯之所以选择《石头记》而不是《红楼梦》作为书名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只是回避一个“红”字,而是回避整个“红楼”意象。这一点从他的译本序中可以看出:

这些翻译的书名(指《红楼梦》)都有点误导读者。他们所唤起的意象——红色屋子里沉睡的人——充满了魅力与神秘;遗憾的是这并非中文所指的内容。旧中国红色外墙的高楼——这正是“红楼”的字面意义——是富贵与荣华的象征。但“红楼”本身很早就具备另一种更特殊的意思。它被用来特指富贵人家女儿的住所,或者更宽泛些,指代女儿们本身。<sup>[7]315</sup>

由于“红楼”意象在英语文化中的缺失,这两个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准确表达出来的,所以只好选择《石头记》这一书名以避开“红楼”二字。

大多数《红楼梦》英译研究者认为霍译书名弃《红楼梦》

不用是妥当之举,因为它“避免了译语读者的误解”,<sup>[6]</sup>“更易为西方人所接受”。<sup>[4]</sup>用《石头记》代替《红楼梦》固然避免了误解,并且强调了小说的故事性,更符合西方文学的诗学规范,但却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正如崔永禄所说:“失去了‘红楼’,失去了‘梦’,削弱了由题目引起的社会意义的联想,给内容的涵盖面造成了巨大损失”,<sup>[8]</sup>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除了杨译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和霍译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之外,《红楼梦》还有一种译名是 *A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译为 *A Red - Chamber Dream*。<sup>[1-2]</sup>但 chamber 意为“卧室”,*A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或者 *A Red - Chamber Dream* 回译过来就成了“那个红色卧室的梦”,让人感觉是特指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那个梦,因为那个梦的发生地点就是秦可卿那充满诱惑与刺激的少妇的闺房。<sup>[3]13</sup> Chamber 这个词局限性很大而且又是以单数形式出现,用以翻译《红楼梦》中的“楼”字有失妥当。<sup>[3]13</sup>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把书名译为 *A Red - Chamber Dream* 会产生误会,因为 red 这个意象在英语中有“流血,血腥”的含义。<sup>[9]</sup>为避免误解,有学者建议直接采用音译,“把‘红楼’作为一种源自中国汉语文化的独特的文化意象,给译语读者以特定信息的暗示,让译语读者熟悉和理解其文化涵义”。<sup>[6]</sup>然而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来说,“Hong Lou Meng”不过是一串毫无意义的陌生符号而已,何以了解其深刻的文化含义呢?毕竟“红楼梦”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十分抽象的文化意象。

### 三 中西文化交融与可译性限度的动态变化

“红楼”二字的翻译争论至今而仍无定论,文化意象翻译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王佐良先生<sup>[10]34</sup>曾说:“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力气去解释。”包惠南<sup>[11]341</sup>在其《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一书中也说:“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产物,都有着其悠久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生态环境、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因此每一种语言都由其特定的词汇、成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反映这些观念或事物。翻译时这些文化负载词往往使译者捉襟见肘,陷入‘旬月踟蹰’的困境,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之对等或对应的词语,不得不采取音译或音译加注的方法表达其大概的语义,有的甚至只得‘望词兴叹’略而不译。之中具有特定民族文化内涵词语的可译性限度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尤为突出,从而使作品的语言风格、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对于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sup>[12]95</sup>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也有所论及。他把不可译性分为两类: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并且认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只是相对的,即在本质上是可译的,只是人们一时缺乏相应的表达方式;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则是绝对的,是真正的不可译。但如果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化上的不可译性其实也是相对的,是动态的、变化的,而不是绝对的、静止的、永恒的。随着各民族交往的

深入、文化交流的频繁,各个民族文化在相互接触和交流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种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会被另一种文化所接受和吸纳,从而使一些原本不可译的词语逐渐变得可译。例如 democracy 和 science 在五四时期还属于不可译的词汇,只能音译为“德莫克拉西”和“赛恩斯”,或谑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而在今天,“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汉语中的普通词汇;另如“鳄鱼的眼泪”(crocodile's tears)、“武装到牙齿”(armed to teeth)等西方文化意象也已成为汉语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不可译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各民族间文化交融的逐渐增强而不断向可译性转化。<sup>[13]</sup>

因此,从这个趋势来看,文化意象的翻译应该尽量采取异化手段,使用“文化传真”的方式,尽可能完整地传递源语意象,以使译语读者通过翻译了解异域文化,满足跨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向外传播本民族文化。如果“意”“象”不能两全,则取“象”而舍“意”,即保留源语中的意象符号,期待中西文化的融合使西方读者对中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而逐渐理解其文化内涵。一味归化或回避不利于弘扬中华文化,甚至可能因为文化交流的逆差过大而造成文化失语现象。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文化意象的可译性限度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文化交流与融合会逐步缩小语言文化间的距离,从而降低文化因素的可译性限度。一些源语所特有的文化意象随着各民族间文化交融的增强,逐渐会为译语读者理解与接受,使得某些不可译因素逐步得以消除。因此,就《红楼梦》书名的翻译而言,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以及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来看,保留“红楼”意象的直译法更为可取。相信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红楼”这一意象必将会为西方国家的人们理解与欣赏,而《红楼梦》这部鸿篇巨著也必将最终获得全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的喜爱。

#### 参考文献:

- [1] 黄龙.《红楼梦》书名的翻译[J].中国翻译,1986(4).
- [2] 萧钟和.《红楼梦》英译探源及书名译法商榷[J].外语教学,1986(2).
- [3] 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 [4] 罗选民.从互文性看《红楼梦》书名的两种英译[M]//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5] 俞晓红.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 [6] 吴毅.关于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从《红楼梦》英译本中原语文化意象的缺损谈起[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 [7] 范圣宇.《红楼梦》管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8] 崔永禄.霍克斯译《红楼梦》中倾向性问题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5).
- [9] 陈国华.《红楼梦》和《石头记》:版本和英译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6).
- [10] 王佐良.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 [11]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 [12]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3] 林红.文化视域下的译者、读者与可译性限度[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6).

(责任编辑:李珂)

## 简讯

### 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全国学术研究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在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及纪念五四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90周年之际,“第一届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全国学术研究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4月10日到13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和湘潭市召开。会议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全国语言理论研究和教学研究会(筹备)联合主办,由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联合承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日本、泰国的13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收到论文180多篇。会议主题是:探讨21世纪中国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趋势。会议还正式宣告成立“全国语言理论研究和教学研究会”,由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教授出任首任会长。这次学术交流会意义重大,是中国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领域的第一次盛会,是展示语言理论研究成果的大会,对推动全国大学“语言学概论”学科和课程建设有积极的意义。

(李珂)